

周其仁:医疗服务是开放最差的部门——医改系列评论(7)

周其仁:医疗服务是开放最差的部门——医改系列评论(7)

在GOOGLE搜索此内容

2007-4-13 阅读2189次

猪年伊始,先回应读者两个问题。一位问,你的医改评论还要写多少?答,没有计划,把有意思的内容写完了就停笔。另一位问,你究竟主张怎样解决问题?我的回应,“主张”远不如现象的梳理和解释来得重要。搞不清楚现状和问题,张口就来的“普渡众生”解决方案,真的那么有意思吗?

言归正传,继续探察我国医疗服务的状况和问题。我们已经发现,流行的“看病贵、看病难”呼声,不经意之间掩盖了另外一个现象,那就是在尚存的“公费医疗”范围内,一些人“看病太便宜”,以至过多占用了本来就不足够的医疗资源。给定政府主导医疗服务的框架,剩下无缘享受“公费医疗”的庞大人群,只好面对看病贵和看病难。

这显然不单是医疗体制造成的,也不可能单靠医改就得到解决的问题。深究下去,如当下舆论所云,“涉及经济体制、政治体制、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的全面改革”。问题是,全面改革谈何容易!经验提示,说得很全面的改革大计,做起来常常寸步难行。总不能恳请疾病缠身的人家,耐心等到“全面改革成功”以后再免除疾病的痛苦吧?

于是,除了“根本解决”之外,还有一个在给定的现实条件下,能不能“改善”或“缓解”一下的问题。具体地说,就是在国家财政给钱不多、“公费医疗”又占用资源不少的情况下,广大非公费医疗覆盖的人群能不能得到更多一点的医疗服务,能不能减轻一点“看病贵看病难”的实际负担?

参考其他领域的经验,我认为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。想起来似乎不太困难,政府没钱还不能给政策?——大手开放医疗服务,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参与医疗服务就是了。不敢说这一招包治百病,但增加了医疗服务的供给,至少总可以缓解“看病贵看病难”吧?

可是横看竖看,我国医疗服务的实际开放程度低得惊人。数据引过了,反正改革开放二十多年,在这个被定名为“市场化过度”的领域,80%的医院仍然是政府医院,96%的床位按非盈利医疗机构注册。过去几年卫生部的报告,多少还提到“动员社会资源参与医疗服务”,可是最近“全民医保”的庞然大计,似乎再也不提此项内容。究竟发生了什么?是不再需要了,还是即便医疗服务的大门洞开,就是无人愿意问津吗?

情形不是这样的。举一个例,北大所在的中关村地区,早在2000年就传出要开长庚医院的消息。那可不是政府的手笔,因为投资和管理的主体皆不是政府,而是台塑公司旗下的一个非营利财团法人。90年代中我第一次访问台湾,听过长庚医院的故事。讲起来,是一件非常“私人”的事务,无非是商场上功成名就的“经营之神”台塑董事长王永庆,为纪念他父亲王长庚先生,投资并管理了一个非公立医疗机构。可是,长庚医院的确给社会带来巨大的“公益”效果:作为一家创立于1976年的非盈利民营医疗机构,长庚医院在台湾的个院区、8300张病床,每年提供的医疗服务占全台湾总量的五分之一。问过在台的亲戚和其他朋友,对长庚医院的服务品质无不称赞有加,无疑是一间拥有良好声誉的医疗机构。

长庚医院要开到中关村,不是很好吗?这里素有“中国的硅谷”之称,以高校密集、知识分子集中而知名天下。可也就是在这个地方,屡屡传来中年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不幸消息。没有看到仔细的分析报告,猜想应该不是因为没钱看不起病,但工作压力重,有病也排不起医院那个队、受不了看病那份折磨的,恐怕所在多有。听到台湾的长庚医院要来,办一个规模大到5000张床位的综合性医疗科研教学机构,中关村人哪个会不高兴?

可是六年时间过去了,听得楼梯响、不见人下来。消息时好时坏,反正到最后长庚医院也没有在北京开张。读过一些报道,有说是台湾当局阻挠资本外移的结果,也有说王永庆坚

持独资、与这里的外资法相抵触。究竟什么原因，扑朔迷离，外人不容易明白。不管其中多少是非曲直，从结果看，长庚没有入户口北京就是了。去年听说终于在厦门开了一个长庚院区，500个床位的规模，远胜于无，但也算不上大展宏图。

考虑到医疗服务对品牌的依赖，向经得起时间蹂躏的国际大型医疗机构开放，应该是上策。可是举目四望，长庚医院没有大步进来，其他著名医疗机构也没有进来多少。台湾的机构有障碍，台湾以外还有很多国际大医疗机构呀。如果企业办医院“不适宜”，政府间的国际医疗合作又怎么样了？仍以北京为例，中日人民友好医院怎么看也是一家上好的医院，可数来数去，好像仅此一家而已。中英人民不是也很友好吗？中加人民、中德人民、中美人民、中澳人民呢？以中国今天的国际影响和外交地位，不应该只有一家中日医院吧？多开上那么几家，媒体戏称“全国人民上协和”的压力总可以减轻一点的。

说到协和，又引出一个敏感话题：为什么不选一些教会医院允许来华行医？协和本来就是教会医院，治过国人的病也救过国人的命，更培养了很多国手级的大夫，为中国保有一个现代医学和现代医院的宝贵传统。另外一例，当年毛主席的保健医生、也是从红军到解放军时代军队卫生工作的领导人傅连璋，参加革命前不也是福建长汀一家教会医院的院长吗？这说明，即使在国家主权不完整的历史年代，教会医院对中国和中国人也不全盘有害无益。今天国家有了强大主权，选一些教会医院网开一面，救一救国内医疗的燃眉之急，真有什么控制不了的危险吗？

可是说破了天，本来开放潜力及其巨大的医疗服务，反倒成为开放年代里开放程度最低的一个部门。不要比制造业和商业，就是与同样问题重重的教育相比，医疗服务的开放程度也差了一大截。不同意此论的朋友，不妨随机找几个人问问：听说过微软中国、惠普中国没有？知道不知道满中国跑的小汽车，绝大多数是中外合资制造？吃没吃过麦当劳的汉堡包，认不认得肯塔基的老人家？可是若问，有谁体验、接触、甚至听说过境外医疗机构或医生的服务的，国人中实在凤毛麟角！

高端不开放，低端的也开放不够。“中医不再姓中”是我去年写过的文章，取材于中国本土的中医日渐衰弱，而欧美日本却把中医中药针灸技术，纳入了向他们国家人民提供医疗服务的合法轨道。说来不容易相信，数千年师徒相传、父子相承的传统中医，民间据说尚存百万之众，可你就算华佗再世，今天也难拿合法行医的执照！真的呜呼哀哉，明明有大量可动员的内外社会资源，偏要作茧自缚、画地为牢。“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两处茫茫皆不见”，只剩下一条路：天天听老百姓呼号“看病贵、看病难”，仿佛那是自然界里的一道风景线。

为什么医疗服务的开放程度特别低？这个问题还颇费思量。是中关村的一位医生提醒了我，他认为长庚项目难产的原因，是主管当局多少害怕新医院来了把老医院的好医生挖走——“我们真盼着长庚来挖人呢！”不过这个“害怕竞争说”也有问题：为什么官家招待所以外，那些真正市场化的餐饮服务不断破土而出？难道当年那些个招待所就不怕竞争吗？

查下去，答案是新餐馆无须得到招待所或招待所主管部门的审批同意。相比之下，拥有“自己”直属医院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，却同时控制着新医院的审批权。此种制度安排下，“抑制竞争”合乎逻辑，主动开放就不那么正常了。

相关信息：

没有相关信息

相关评论：

没有相关评论 [点这里发表评论](#)



发表、查看更多关于该信息的评论



打印本页

| [北京大学](#) | [中心概况](#) | [BIMBA](#) | [CENET](#) | [联系方式](#) | [站点导航](#) | [繁体版](#) | [ENGLISH VERSION](#) |

Copyright© 1998-2005 北京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版权所有

保留所有权利，未经允许请勿挪用，有任何问题与建议请联络：webmaster@ccer.pku.edu.cn

京ICP备05005746